

王谟及其文献辑佚活动评述

褚 贛 生

王谟，是清代一位颇有成就的文献辑佚学家。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却很少为世人所知。直到六十年代初，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王谟所编《汉唐地理书钞》，《文汇报》发表了胡道静先生的读该书的后记之后，王谟及其成就才渐被人所重视。这是由于有关王谟生平事迹的资料实在不多的缘故。《清史稿》及清人文集中皆无其传。《金溪县志》与《清史列传》虽有其传，但既简略，又有牴牾。由于专业关系，本人对尽可能搜集到的王谟七种有关文献辑佚的存世之作作了一番研读，并结合一些有关资料，对王谟的身世、经历、思想及其文献辑佚活动作一些探索，不当之处，望请方家指正。

一

王谟，江西金溪县人，字仁圃，号汝上老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享年八十有六。他出生于一个清寒的读书人家，其父为人教读，故其幼时即“侍先君子讲业浚阳山中”，后遵父命“从事吴兴沈泊村师于豫章”，^①开始进一步研读，为日后进行学术工作打下了一个较坚实的基础。他“疾俗学孤陋，好博览考证，雅慕郑迪功、马端临之学”，^②尤其对古文献搜辑整理感兴趣。

王谟的文献辑佚活动开始于他少时所撰《江西风土赋》，此

后一直到老未辍。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因这些活动与其经历有一定关系，故下面将二者一并述及。

第一阶段，也可称为编辑乡邦文献阶段。时间从他少年时到其中举后不久，约二十余年。

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特别是宋以来人文蔚起，饮誉海内。王謨自小对此十分向往、倾慕，但他感叹“先贤著述传世绝少”，于是萌愿欲搜罗江西古代文献。他首先利用收集到的资料，撰就《江西风土赋》一文，对江西的地理、古迹、风俗、物产等作了叙述。因其过于简略（仅万余言），王謨对之不甚满意，后扩而展之，于乾隆三十二年编成《江西考古录》八卷。

乾隆三十三年，王謨中举。次年赴京赶考，不第。途中求学购书，砥砺学问。乾隆三十五年，他侨居南昌为人教馆，同时将多年抄辑的有关江西古代人事、著述的资料编辑成书，一为《江阳典录》十四篇，一为《豫章十代文献略》五十二卷。后者于乾隆三十九年刻印。王謨编这两书受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影响很大，他说：“昔常氏之志《华阳》也，于一方人物丁宁反复，如恐有遗，虽蛮髦之民，井臼之妇，苟有可纪，必著于书。謨尝三复其书而矜其志，亦发愤思网罗乡里放失旧闻，覃思研精垂二十年，遇有涉猎，必载铅槧，手所钞纂，几盈篋衍”，^③后终成篇。

以上四种著述可谓珠联璧合，各从不同方面收集了有关江西的古代文献资料，经整理排比，分门别类，遂各自成书，大大弥补了江西地方文献的不足。

第二阶段，即编辑有关教学辅导参考书时期。自在南昌教馆直到他任职建昌郡学初期，约十五年左右。

在这一阶段，由于职业关系，他与学子生员经常接触，了解到他们在学习上的一些实际困难与愿望。为适应当时教育与科考

的需要，王谟一边教学，一边留意抄辑资料，于乾隆四十二年出版了《十三经策案》二十卷。该书主要内容为王谟多年所“杂记诸经大义疑难，并摘《困学纪闻》、《黄氏四钞》，及郑夹漈、马贵与、洪容斋、罗长源诸家所说经义若干条，……且为之疏解。”^④据说此书出版后大受读书人欢迎，“不胫而走，几于家置一编。”^⑤

乾隆四十三年，王谟中进士。他“以专志著述，不欲为令，请改学职，选授建昌府学教授”，于四十五年三月到任就职。在这里他对教学工作依然认真负责，“以实学训士，生徒景附”。另外，为满足学生学习之需，在同事的鼓励下，他将自编讲义编纂成书，名为《读书引》，于乾隆四十八年印行。此书原为王谟从“其文多散佚，或以书颇稀秘及卷帙繁重，不尽得见”之书中抄辑出来的序文，共二百余篇，费时多年，后经他“作自序阐其书义，标凡例、目录，以定其体裁，其中有附补、附录”，然后定稿。王谟认为此书“或可为家贫而质鲁者读书之一法也”。

第三阶段，为大规模抄辑整理汉魏（后扩展到唐代）亡佚之书时期。从王谟在建昌郡学任教后几年始，直至其谢世止，约三十五年上下。

到建昌郡学后，王谟获得了两个有利的著述条件，一没有俗务干扰，时间宽裕；二这里有一批公家藏书，可供其参阅利用。对从事文献辑佚活动有着浓厚兴趣的王谟如鱼得水。

这一时期可谓王谟文献辑佚活动的黄金时期，主要成就有（增订）《汉魏丛书》、《汉魏遗书钞》及由此书划分出来而独立成篇的《汉唐地理书钞》。

《汉魏丛书》最早为明何鏊所编，旧目原有百种，后程荣刻印时仅三十八种（王谟序中称三十七种，系缺算《商子》，故误），之后何允中再增补为七十六种。在此基础上，王谟又加意搜罗，先“搜为八十六种，又广为九十四种，罗致宏富，洵为巨观”。

乾隆五十六年初版，嘉庆时又有修订版。

《汉魏遗书钞》原系一部大规模的遗书汇编（王谟认为所收不是原书，故不得冒丛书名）。下面一段话比较清楚地表明了王谟编此书的起因及决心。他说：“考隋、唐二《志》所载四部书目，有专本行世者不过数百种，其已消沉磨灭化为乌有者不可胜数。若其书虽亡，而尚有零篇断简，单辞只句散见他书者，正赖有好事者采而辑之，犹可存十一于千百。谟不揣愚陋，窃按隋、唐二《志》门类，分别搜讨。……日钞月纂，铢累寸积，始得四五百种。”^⑥该书本计划分“经翼”、“别史”、“子余”、“载籍”四大类，逐步整理刻印。但因为已刻好的“经翼”类书版在嘉庆四年遭火灾而毁（估计在同年王谟自建昌郡学告归，时年六十七），再经重新集资刻印又费几年周折，王谟不免感到心力已瘁，加上他对地理书之作用日益看重，倾注心血也最多，“遂将别史、子余、载籍各种遗书概行度置”，而将地理书一门“先行开雕，附经籍后”。故《汉魏遗书钞》仅刻印了“经翼”类，时当为嘉庆十一年之后，至于另外三部分书稿恐怕是早已亡佚了。

《汉唐地理书钞》确为王谟的精心之作，它本属《汉魏遗书钞》“别史”类中的一门，后因王谟认识到古地理书“得确然知往古封建与后世州郡制度因革损益，以及四海万国輿图广袤之数，诚国家要务而作史者尤当以是为首重也。”^⑦故他欲远追南朝陆澄、任昉之绪（二人皆编过大部头的地理书），突破了“只以百种为率”的原计划，“究于陆、任二家原存五十二家外，……更合隋、唐二《志》，并加搜讨，增拓至五百余种，别为《汉唐地理书钞》。”^⑧原定于嘉庆十六年开雕，后又因“困于财力，迫以时日，谅不能一律尅期告竣”，便又重作修订省并，分为前后两编，前编四册，后编八册，“以前编为主，后编姑从度置”，^⑨时王谟已八十二岁，约为嘉庆十八年。据现在看来，前编四册共二百四十九种大概都没刻完，至于具体情况如何，因资料缺乏，

已难以考证。^⑩

以上就王谟七部存世之作对其文献辑佚活动与经历作了粗线条的勾勒，肯定不够全面、深刻。因实际上王谟一生著述甚富，除已刊之外，尚有“经说、杂著二十四种，并诗文藏于家”。^⑪据现存书目看来，其中还有不少是关于文献辑佚的，可惜都已失传，致使后人难窥其全貌。

二

王谟生活的时代，正是考据成风的清朝乾嘉时期，当时流行的那种言必有据、无徵不信的学风对他影响是不弱的，对他在文献活动中取得较大成就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他自己就不讳言地说过：“我国家久道化成，儒术日盛，海内士无穷达，莫不知以通经好古为有体有用实学。”^⑫这一思想在他的文献活动中当然有所反映。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王谟毕竟又不同于那些不问现实、一味好古的乾嘉学者。他们“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⑬与之相反，王谟则是极力将其文献辑佚活动与当时社会现实相结合，强调经世致用。他认为“士不通经，不足致用。如果经术湛深，即于古今政术治体一以贯之，未有不通于时务者”。^⑭尽管他也崇尚儒家经典，但着眼点却是古为今用、处理时务。这一思想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另外，王谟还具体谈到了他对文献辑佚有实用价值的看法。他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立之之道，曰文与献。文以徵言，献以徵人，二者国之纪纲也。……然则文献缺略，虽夏殷之美盛，直推为天造草昧可也；文献修明，虽巴蜀之僻陋，进而与邹鲁同风可也。”^⑮

在具体的文献活动中，王谟也切实贯彻了上述思想认识。他

在所编《汉唐地理书钞》之首，开宗明义地声称该书宗旨：“地理书钞者，钞录隋、唐二《志》所载汉魏以来传记、图经，以略存陆、任（按：指南朝陆澄、任昉二人，他们都编过大部头的地理书）二家书钞体例，而资直省州县志书采辑也。”^⑩其友何飞熊也说：王谟“近为《江西考古录》十卷，又《十代文献略》若干卷，思以羽翼通志，于其缺者补之，讹者正之，疑者辨之，穴幽阐奥，搜抉无疑。”^⑪同样指出了王谟的实用目的，至于王谟为教学需要而着手文献编辑，其目的就更明显了。总之，正因为王谟对文献活动抱有上述思想认识，所以他才几乎穷一生之力，竭一身之才而孜孜于古文献的抄辑与整理。

上面概括地分析了王谟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下面再具体谈谈他是如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事文献辑佚工作的。这里着重分析他的方法问题。

关于王谟在文献辑佚上的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按录钩索，分类探求。我国的古文献虽代有亡佚，但存世者仍汗牛充栋，浩如瀚海，如欲从中寻找所需文献资料，不掌握一定方法是行不通的。王谟的做法是先熟悉目录，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按门类去收集，并确定一个大致范围。如他编《汉魏遗书钞》即是“按隋、唐二《志》门类分别搜讨，经部则以孔氏、贾氏《正义》、陆氏《释文》为主，史部则以裴氏《集解》、颜监、刘昭、章怀各注为主，不足则参之四大类书，又不足则求之汉魏以来各古书注及宋元以来诸说部书，有引用某氏经者，即以还某经，引用某氏史者，即以还某史，引用某子、某传记者，即以还某子、某传记。”^⑫如此，便能明确辑佚方向、范围，找到门径，提高效率。

（二）博览群书，广泛搜讨。古文献辑佚是件十分繁琐的工作，因原书大多亡佚，仅有部分内容零碎地散见于众多古籍之中。为尽可能地恢复原书之貌，不博览群书是不行的，而且还得

有披沙滤金，钩沉索隐的耐心功夫。王谟在这方面比较突出，自称“平生颇有书癖，诸所涉猎，犹略能通知大意”^{①9}，为他从事古文献辑佚打下了基础。此外，他在抄辑文献资料时，不但充分利用几部大型类书、丛书，而且还尽可能地广为搜集其他书籍中的有关材料。如他编辑《汉唐地理书钞》时就很注重此方法，他说：“六朝时人注书，如酈道元《水经注》及裴骃《史记注》、贾思勰《齐民要术》、稽含《南方草木状》、戴凯之《竹谱》、宗懔《荆楚岁时记》等书，亦间引诸州郡记，今亦从《津逮秘书》、《汉郡丛书》本中钞出，与《类聚》、《御览》诸书参补。”^{②0}又如他编《豫章十代文献略》亦强调：“凡有篇目具隋唐《志》，而其佚散见他书者，即单词片语，亟为收录。……至汉唐以来稗官小说有异闻轶事可补史传之阙者，亦兼采焉。”^{②1}

（三）、综合排比，编次整理。在文献辑佚工作中，能将有关资料抄辑到手无疑是重要的，但也不能忽略对所辑材料进行整理编排，否则，只会削弱这些资料的价值。王谟在编《汉唐地理书钞》中就成功地运用了此方法，他先将该书编为四册（集），“又区为十二门类，亦自有纲有目，有经有纬。疆索广轮，纵横离合，可以验历朝气运盛衰者为纲，州郡部次，类聚群分，可以观各方气候通塞者为目。山川疆域，星野风气，不可得而变革者为经；都邑名胜，人物事迹，有与时为变通者为纬。大要先纲后目，先经后纬，庶亦有条不紊。”^{②2}

（四）考辨订正，相互校勘。王谟不但对所辑资料进行编排整理，而且为了使资料确实无误，他还对之作了进一步的考辨订正。如他对所辑郑玄《论语注》就如此做了。他说（该书）“自周、齐至隋盛行于人间，《唐书》犹著录，至赵宋始不入志。意五代之际其书已亡，故未见有传本。顷得元和惠定宇先生辑本二卷，据卢抱经序言，原本亦王深宁所辑，诚不易得，为亟登入《汉魏遗书》。但以愚所钞群书校之，犹多遗漏，因就惠本更加

补订。”^{②③}又如他在编《江西考古录》时说：“古今地理书重复纷纭，难以尽悉。兹录独于《山海经》、《水经注》二书诠释尤详、驳论亦少，至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书，虽多徵引，然必有疑误，始为考正，否则存而不论。”^{②④}另外，王谟还将自己的考辨意见作一序录冠于所辑文献之首，“叙录本书来历，流传大概，并略具作书人出处事迹，下附案语，注引某书几条。”^{②⑤}提纲挈领，给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王谟在文献辑佚上的方法是比较科学可取的，这也是他所以能在文献辑佚上取得较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纵观王谟一生，他几乎从未停止过文献辑佚活动。且不说他那些已失传的著述，仅以现存的《江西考古录》、《豫章十代文献略》、《十三经策案》、《读书引》（增订）、《汉魏丛书》、《汉魏遗书钞》、《汉唐地理书钞》来说，也足可称得上规模宏巨，成果卓著。这在中国文献学史上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对他这一系列文献活动理应作出客观的评价，给他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自书籍出现后，恐怕也就随之出现了书籍的亡佚。书籍亡佚的原因很多，但以兵火之灾为最。昔张海鹏“尝慨古今载籍几经厄劫，历观史志所载及藏弃家所著录，百无一二。”^{②⑥}就道出了这种情况。王谟对此当然也感慨，但他在感叹之余，着手进行了对古文献的搜辑爬梳工作，从而尽可能地恢复与抢救了不少失传的文献。仅以现存的《汉魏遗书钞》与《汉唐地理书钞》为例，前者就辑经学书一百余种，后者亦收地理书七十来种。

我们知道，研究历史是离不开文献资料的。但由于许多古文

献皆湮没散失，这势必给后人进行历史研究带来不便。然而王谟的辑佚成果却多少对此作了一些补救，其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历史地理学 在王谟所辑地理书中，有不少资料有利于这方面研究。以其所辑应劭《地理风俗记》为例，就可提供以下几种资料：1. 东汉时一些地名来历。如“敦煌酒泉，其水甘若酒味也；张掖，言张国臂腋，以威羌狄。”又如“夏水出城父东南，至此与肥合，故曰合肥”。2. 东汉时一些地方的地理位置。如“千乘县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漯沃城，故县也”。3. 东汉时的河流水情。如“漯水，东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则通津委海，水耗则微涓绝流。”

（二）方志学 王谟所辑地理书种多面广，时间跨度也较大，其内容对方志学研究有很大帮助。如通过对其所辑秦汉时的《三秦记》、《秦地图》、《地理风俗记》等书内容分析，便可知道当时这类书实已开后世方志某一门类之先河。又据所辑盛弘之《荆州记》的内容，我们可了解魏晋南北朝时的这一类地理书既述地理，又载古迹，不但记物产，也录神话传说，而且还收旧事轶闻，实具方志雏形。这都有助于对方志发展史的研究。另外，王谟所辑资料还有不少能直接为方志编纂所用。在他编《汉唐地理书钞》时，武陵赵籛楼便托人“来钞武陵、沅陵诸传记采入《常德府志》。”就是在今天我们编修新志中，也仍然可以从中参考或采择一些有关资料。

（三）思想学术史 一般地说，我国传统的思想学术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学史，而经学主要是在两汉才形成发展的。因此，王谟所辑汉魏时亡佚的经学著作，就大大有利于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如郑玄《孝经注》、赵岐《孟子章指》、郭象《论语隐义》皆失传已久，幸赖王谟抄辑成文，俾后人得知大概。

（四）地方史 王谟早年所辑古文献有不少是关于江西的，

内容广泛，资料丰富，这无疑为江西地方史研究提供了方便。此外，他所辑的《南雍州记》、《三秦记》之类地理书，也为这些地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资料，诚如王谟所讲：这些地方文献“或通纪地理，或专录人材，虽率尔述作，不可谓非一方掌故也。”^②

除上述几方面外，王谟所辑文献资料还对民俗学、经济史、文学等方面研究有参考价值，在此就不详述了。

值得提出的是，王谟在文献辑佚上的成就是在在一个比较困难的境况下取得的。这里说的困难，一是讲藏书有限，善本缺乏；二是说他独力完成，旷日持久。自古以来，凡有志从事文献工作的人，他都具备一个先决条件，或是本人藏书丰富，或是能利用藏书丰富的人家或单位。远如陆澄、任昉，一为“家多坟籍，人所罕见”，一为“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近如朱彝尊、严可均、前者自称“拥书八万卷，足以豪矣。”后者亦“购藏书至二万余卷。”晚如马国翰、黄奭，二人也都“藏书甚富。”王谟却远远不能与他们相比，尽管“馆谷收入，无不一用之于书”，但数量毕竟有限，如此，只得求助于他人及郡学的藏书，可惜又乏善本。王谟不止一次谈到这种苦恼，如“所采诸序多系借抄，或不免讹谬，亦有古本原文脱误者，既未得善本校勘，又不敢意为改订，姑仍阙疑，惟冀览者垂谅焉。”又如“《太平御览》一书最为难得，兹所借钞，亦系旧本活字版，错简脱叶，阙文讹字，不可胜数，苦无善本校对，不敢以意补缀。”就是在这种艰难条件下，王谟仍乐此不疲，坚持不懈。为了弥补无善本之弊，以及防止因独力完成而带来的“孤陋”之病，王谟编辑每一种书都请人参阅、校勘。如《汉唐地理书钞》就经四十四人参校，其中三十二位外省人则参校其熟悉的家乡部分。象四川人冯履晋参阅《蜀王本纪》、湖北襄阳人樊学淦校《襄阳记》、湖南武陵人赵郭诗校《武陵记》。

勿庸讳言，王谟在文献辑佚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

过分重视资料的援引，忽视编纂体例。王谟自己就几次表示过这种认识，如：“是录多用注疏文体，反复援引，转相训释，……文之工拙非所计也。”^②“兹略悉钞史传原文，宁繁无简，宁滥无苛，固不敢以体要自居也。”^③这种看法是偏颇的，如著述的内容与形式能和谐统一，两全其美，岂不更好？第二，尽管王谟能吸收他人研究成果，又亲自着意考订，还延请旁人参校，但毕竟手头无善本精版，加上与知名学者、藏书家无甚交往，从而在辑佚中沿袭了一些错误。对这种情况，他只是发出“苦无善本校对，不敢以意补缀，沿谬承讹在所不免，甚有因而割弃不录者，用是质诸大家，有能出所藏善本相为校正者，功德正非浅鲜”的感叹。^④第三，引用大部头著述，没有注明确切卷数，于读者查阅不便。王谟曾批评一些旧志书“即所采摭，又不引据原文，标明书目。”自己也强调：“诸所徵引，例标书目，以徵信也。”但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也不够，书目虽都标了，但只是标明引某书几条，又引某书几条，令人难以从原书查对。

尽管王谟在文献辑佚上还存在上述不足，但与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比较起来，毕竟还是瑕不掩瑜，我们认为王谟完全称得上有清一代一位杰出的文献辑佚学家，即使在中国辑佚学史上，他也无愧于与陆澄、任昉、王应麟、章宗源、严可均等人并列。

注：

①④⑫⑭王谟：《十三经策案·序》（以下注释，凡仅标篇名，不引著者姓名者，皆为王谟之作，不另注明）。

②⑪同治《金溪县志》卷二十四《王谟传》。

③⑲《豫章十代文献略·凡例》。③⑮⑳《豫章十代文献略·前序》。

⑤宋延春：《重刊江西考古录序》。⑥⑱《汉魏遗书钞·序》。

⑧⑳㉑㉒㉓《汉唐地理书钞·凡例》。⑦⑯《汉唐地理书钞·序》。

⑨重订《汉唐地理书钞》引言。

⑩就目前所知，仅张国淦看过该书足本，他在《中国古方志考序》中称：

“王谟《汉唐地理书钞》通行本有目无书者，十居七八，昔年曾见一足刻本，本编所据者即此，惜当时未记其来源、卷目，今已无从补录。”

⑬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⑰何飞熊：《江西考古录序》。

⑳《汉魏遗书钞》、郑玄《论语注》序录。㉑㉒《江西考古录·凡例》。

㉓张海鹏《流通·古书约》，《知不足斋丛书》第四十本。

作者单位：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

“批亢捣虚”解

“批亢捣虚”一词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批亢”二字，《索隐》释为“批者，相排比也”，“亢者，敌人相亢拒也”，“谓前人相亢，必须批之”。而《辞源》、《辞海》、《中文大辞典》等则释“批”为“击”，释“亢”为咽喉，意指“抓住敌人要害乘虚而入”。

我们认为，联系上下文，两种解释都不确切。《史记》记载魏伐赵，赵求救于齐，齐国孙臆佐大将田忌设围魏救赵之策，孙子说“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撾，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距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毙于魏也。”

可见，孙子之策是避开敌人强盛的气势，转而攻击敌人防守虚弱处。此处，“批”者，披也，排者，推也。《广韵》“批：推也。”《说文通训定声》“批，假借为排。”（“排”亦推也，如排闥，排户）。嵇康《琴赋》：“心闲手敏，解批如志”，“批”即推按之意。至于“亢”既非“抗”，亦非“吭”，而是阳极，盛极，强极之意。《广雅·释诂》四：“亢，强也”；《申鉴·俗嫌》：“阳极则亢，阴极则凝，亢则有悔，凝则有凶。”阳极盛极必反，故《易·乾卦》：“上九，亢龙有悔”。《疏》：“上九，亢阳之至，大而极盛。”《管子·轻重篇》“诸侯亢强，聘享不上。”可见，“亢”为强盛之意。综上所述，“批亢捣虚”应解释为避开强盛之敌，击其虚弱之处。

• 史双元 •